

《孟子》精读

Philosophy

3. 哲学原典精读系列
主编 | 吴晓明 孙向晨

徐洪兴·著

復旦大學出版社



③. 哲学原典精读系列

主编 | 吴晓明 孙向晨

《孟子》精读 Philosophy

徐洪兴·著

 复旦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孟子》精读/徐洪兴著.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 2010. 8
(哲学原典精读系列)

ISBN 978-7-309-07097-2

I. 孟… II. 徐… III. ①儒家②孟子-研究 IV. B222.5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031292 号

《孟子》精读

徐洪兴 著

出品人/贺圣遂 责任编辑/陈 军

复旦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发行

上海市国权路 579 号 邮编:200433

网址:fupnet@fudanpress.com <http://www.fudanpress.com>

门市零售:86-21-65642857 团体订购:86-21-65118853

外埠邮购:86-21-65109143

上海第二教育学院印刷厂

开本 787×960 1/16 印张 14.75 字数 215 千

2010 年 8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309-07097-2/B·342

定价:25.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向复旦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发行部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总 序

吴晓明

阅读并研习经典，亦即与经典作品的持续“对话”，是人文学术的真正基础。人文学术的基本样式与其他学科不同，它只是在很小的程度上构成所谓“规范的”或现成的知识体系；就其实质而言，它是一种唯有在重多的对话中方能保持其生机的“思想奠基活动”。这意味着，作为某种先行的思想奠基活动，人文学术及其成果毋宁应当被更恰当地理解为诸知识体系孕育其中并植根其上的思想-定向和精神-根据。

对于哲学学术来说，情形尤其如此。因为哲学在根本上就是——并且完全就是——“思想的事情”。而此种思想之事的大端之一，便是为既与的规范知识筹划并准备必要的思想前提和经验法则——规定其活动的领域并为其活动制定基本方向。此间的差别可以较为便捷地提示哲学学术的独特性：真正说来，那构成既与知识体系之思想前提的东西，本身不是现成的知识。事实上，我们在学习过程中有可能观察到这样的情形：既与的知识体系仿佛是展开在一个平面上，你可以通过一定的程序逐步地扩张至整个领域；而思想的事情则仿佛是在垂直于平面的纵向上活动，你往往只有通过占据不同高度的上升运动才能不断地扩展自己的视野。大体说来，这就意味着哲学与知性科学在学科性质上的一种差别。

正是这种性质上的差别决定了哲学研习的基本方式。它只是在极其有限的范围内才能依赖于“教程”或“教科书”之类的形式体系，而由此让渡出来的巨大区域正应当为经典的研习所占据，并成为研习者与之积极对话的广阔

空间。在某种提示性的意义上可以说,比较起沃尔夫空洞的教材式“体系”,康德的“批判”会重要得多;对于真正的哲学研习来说,这两者的价值几乎是难以比拟的。

我们在这里之所以特别强调这一点,是为了突出地表明哲学学术的特点,而决不意味着知识的获取和积累因此是无关紧要的。“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这向来是对此一问题之最为正当的领会方式。但是,既然哲学依其本质来说就是思想的事情,那么,这里的一切“所学”总已先行地从属于“能思”了。也就是说,哲学之本己的任务——开启并守护思想,乃是一切可称之为哲学“知识”的东西始终围绕着旋转的枢轴;离开了这个枢轴,固然知识的东西还可以保留下来,但已不再是——或很少是——真正“哲学的”了。因此之故,我们几乎可以说,哲学学术的唯一正途,便是阅读并研习经典,即与真正的“思者”保持对话,以便使开启并守护思想之事能够不间断地付诸实行。一切既与的知识体系固然无疑是思想的成果,但哲学所关注的那一度是:思想的开展本身以及这种开展所需要的前提和条件。

然而,哲学作为思想的事情,却并不仅仅是思想的“内部自身”。它从根本上来说关乎时代,关乎时代的精神状况与经验样式,关乎时代的根本问题与未来命运。正如黑格尔所说,哲学无非是被把握在思想中的时代。那些被称为“哲学经典”的著作之所以成为经典,不仅在于其生动活跃的原创性思想,而且在于这些思想深深植根其中的那个时代被决定性地道说出来了。真正的哲学家,无论他自己是否清楚地意识到这一点,总已使思想的锋芒最关本质地涵泳于时代的风云中了。即使是那些最为孤寂、看起来只是一味沉思冥想的哲学家,即使是那些最为深奥、读起来总是一派晦涩玄远的哲学著作,无一例外地总是时代的产儿,并且总是依循其揭示并切中时代的深度来获得其品题和权衡的。常常伫立在雪地里沉思的苏格拉底是如此,往往奔波劳苦的孔夫子也是如此;笛卡尔的“我思”是如此,王阳明的“良知”也是如此。至于说到黑格尔,那么海德格尔曾这样评论道:新时代的劳动的形而上学本质,在《精神现象学》中是被深刻地道说出来了。

如果说,在那些几经翻拓的知识读本中,哲学思想和时代境况已经被渐次分离开来并从而变得难以识别的话,那么,经典著作的优越性恰恰在于:上述联系能够以一种有机的生命体的形式显现出来;而这就意味着,在我们能够从中真正读懂思想的地方,我们同时也真正读懂了那个时代,读懂了在时代的根本问题及其应答中开展出来的实际思想进程。指出这一点是重要的,因为对于哲学来说,体现在其经典源头中的思想本身又是依时代的性质来定向的;依此定向我们便能积极地寻绎并领会哲学思想的本质来历。而只有当这种本质来历被牢牢地把握住的时候,思想的航船才能够避开各种无内容的抽象——“外部反思”以及由之而来的疏阔散宕的“意见”——而重新扬帆起航。

当哲学思想的本质来历能够被较为切近地领会到的时候,思想的开展过程以及这种开展所需要的前提和条件就开始显现出来了。因此之故,就像哲学本身要力求体现为批判的思想一样,对经典著作的阅读和研习也应当成为批判的思想。“批判”一词之原初和简要的含义是:澄清前提并划定界限。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意味着,澄清人类知识的先验前提,并通过通过对这种知识的划界来为信仰留出地盘。而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所做的工作无非是:澄清现代经济生活——政治经济学只是其理论表现——之现实的历史前提,并依循对这种经济生活的批判性分析而揭示其历史的限度。如果说,当今的哲学只有通过真正批判的思想才能深入到社会现实之中,那么同样,哲学的研习也只有通过批判性的阅读——真正的“对话”——才能以思想之本己的形式深入到经典著作的思想之中。黑格尔曾这样说过,什么叫自由的思想?自由的思想就是不接受未经审查其前提的思想。

当我们把批判的思想理解为澄清前提和划定界限,又把批判的阅读理解为真正的对话时,这里所强调的无非是:正像一切历史现象都有其前提和界限一样,任何一种经典的哲学思想同样有其前提和界限;唯其如此并且因为如此,我们才可能由某种思想而开始自己去思想。因此,批判性阅读的要义就在于,经由一种名副其实的“对话”而开始自己的思想——这才意味着真

正自由的思想。

此外,也许还应当提一下的是,尽管哲学经典的决定性根基在于“思想之事”,但它们也和其他学科的经典作品一样,是真正意义上的“学术典范”。这一点对于我们的研习者来说当然也是十分重要的。深入地阅读、研习经典作品并与之亲熟,是在学术上能够根深蒂固、并从而能够厚积薄发的不二法门。开展出广大学术空间的奠基之事,唯在“入门以正”、“取法乎上”而已。因此,凡志于学术或乐于求索者,必以经典作品为师。这正合严羽在《沧浪诗话》中所说,“此乃是从顶领上做来,谓之向上一路,谓之直截根源,谓之顿门,谓之单刀直入也。”

我们在这里奉献给大家的“哲学原典精读系列”,是由哲学学院的诸多教师精心撰著的。其主旨便是开辟出一些小径,以便我们的研习者能够较为便捷地通达并深入于哲学经典的堂奥。这个系列的作品真正说来乃是一种“阶梯”或“导引”,是一种唯独对于探索者来说具有提示作用的“路标”。因此,它绝对不能代替对原典本身的研读,而只是期望把研习者唤入到一种批判性阅读-对话的境域中去。只要能够真正被唤入到这个境域,思想之切近开启的真实可能性便已然出现了,而我们这个教材系列的主要目的也就达到了。

哲学是思想的事情,而思想的事情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当务之急。如果说,当下的历史性实践已经开始逐步表明了这一点,那么,但愿有朝一日,当真正重大的思想任务急切地前来同我们照面的时候,我们已做好了充分的准备。诸位年轻的哲学研习者,勉乎哉,勉乎哉。

目 录

导 论	/ 001
一、孟子其人其书	/ 001
二、孟子其人其书的升格过程	/ 007
三、关于《孟子》的研究	/ 011
第一讲 人性与人心	/ 018
一、人性本善	/ 019
二、人之所以会有不善	/ 024
三、“仁义礼智根于心”	/ 027
四、人性之辨	/ 029
五、性命之别	/ 033
第二讲 修身与养性	/ 036
一、存心养性	/ 037
二、先立乎其大	/ 040
三、反求诸己	/ 043
四、养气	/ 048
第三讲 读书与求知	/ 055
一、博学与自得	/ 057
二、教人之法	/ 059
三、知人论世	/ 061

四、知天与知命	/ 063
第四讲 圣贤气象	/ 070
一、“圣人”与“贤人”	/ 071
二、“大人”与“君子”	/ 078
三、“大丈夫”精神	/ 082
第五讲 人伦之道	/ 087
一、事亲为大	/ 089
二、慎终追远	/ 093
三、大孝典范	/ 098
四、君臣有义	/ 100
五、执中行权	/ 107
第六讲 经世思想	/ 113
一、义利之辨	/ 113
二、制民之产与使民以时	/ 118
三、取民有制与井田理想	/ 122
四、劳力与劳心	/ 125
第七讲 王道仁政	/ 131
一、先王之道	/ 132
二、仁政	/ 138
三、王霸之辨	/ 143
四、保民而王	/ 147
五、与民同乐	/ 151
推荐阅读书目	/ 159
本书参考文献	/ 161
附录：《孟子》白文	/ 163

导 论

一、孟子其人其书

在旧时的中国,尤其是宋代以后,孟子可说是个家喻户晓的人物,这大概还得拜南宋后出现的发蒙读物《三字经》所赐。《三字经》劈头就讲“人之初,性本善”,这可是孟子的意思。第二句“性相近,习相远”,那才是孔子的话。可见,从那时起,孟子的地位并不比孔子低。这里,我们就先来讲讲孟子这个人、《孟子》这部书吧。

太史公司马迁写《史记》,惜墨如金,但他还是为孟子立了篇小传,总共一百三十七字(不计标点),原文如下:

孟轲,驺人也。受业子思之门人。道既通,游事齐宣王,宣王不能用。适梁,梁惠王不果所言,则见以为迂远而阔于事情。当是之时,秦用商君,富国强兵;楚、魏用吴起,战胜弱敌;齐威王、宣王用孙子、田忌之徒,而诸侯东面朝齐。天下方务于合从连横,以攻伐为贤,而孟轲乃述唐、虞、三代之德,是以所如者不合。退而与万章之徒序《诗》《书》,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

司马迁的介绍也过于简洁了一点,对现代人说来不易了解,下面根据历代学者的研究稍加展开。

孟子名轲,生活在动荡的战国中期,邹(今山东省邹城市)人。关于孟子的生卒之年,学术界历来有许多说法。据统计,仅孟子的生年之说就有九种

之多,然后又由于各种推算的不同,以及对他寿数的说法不同,可衍生出更多关于孟子卒年之说。这里我们仅取一种相对通行的说法,即孟子生于约公元前 372 年,卒于约公元前 289 年。

古人除名之外还应有字。关于孟子的字,《孟子》书中并未提到过,司马迁在其《史记》中也无记载。到东汉末的赵岐,他在注解《孟子》时就更不清楚了,只能说孟子“名柯,字则未闻也”(《孟子题辞》)。但从魏晋开始,突然冒出孟子字“子车”、“子舆”或“子居”等多种说法。尽管煞有介事,但证据却绝无,且其中还有被学界公认的“伪书”,因此不足凭信。

孟子的先祖是谁?《孟子》七篇中没有说,《史记》、《汉书》及其他与孟子同时代或稍晚的历史文献中也无记载。东汉赵岐在《孟子题辞》中说:“或曰孟子鲁公族孟孙之后。”“或曰”之说表明赵岐也不能完全确定,但学界一般都沿用此说,即认为相传孟子的远祖是鲁国的贵族孟孙氏,后来家道中落,从鲁国迁居邹国。据说孟子幼年丧父,与寡母相依为命,孟母对孟子的教养有道。从《孟子》书中我们知道,孟子对其母亲非常孝敬,以至因葬母时棺槨衣衾太好而遭人非议。从西汉开始,孟母开始成为世所公认的母仪典范,西汉时的文献《烈女传》、《韩诗外传》中记有“孟母三迁”、“孟母断织”、“东家杀豚”等故事,这些故事的真实性虽无从考证,但不妨碍其成为流传千古的美谈。

孟子的师承关系也不太清楚。司马迁说他“受业于子思之门人”,但“子思门人”是哪位?缺乏进一步的说明。从中唐韩愈开始,不少儒家学者都说孟子的老师是子思,子思的老师是曾参,此说后来流传甚广,但无确切的证据,所以也有学者并不认可。根据孟子自己的说法:“予未得为孔子之徒,予私淑诸人也。”(《离娄下》)^①这里的“人”是谁?我们不知道,大概是“子思之门人”吧?而所谓“私淑”,按一般的理解,是指景仰某人的学问但未能登堂入室成为其弟子的说法。因此,孟子直接的老师是谁,至今无法断定。

但不管怎样,有两点似无可怀疑:其一,孟子是儒家学派中人。孟子一生服膺儒学的创始人孔子,认为“自生民以来,未有盛于孔子也”(《公孙丑上》);并以一生学习孔子为志愿,说:“乃所愿,则学孔子也。”(同上)其二,孟子确与战国儒学中子思一派关系颇深,这可从《孟子》书中及战国儒家对孟子

① 按:“本书”中凡引《孟子》语者,书名省略,仅列篇名。

的评价中看出。首先,在《孟子》书中曾多次引述子思的言论,同时也多次引述传为子思老师曾子的言论,可以说除孔子外,《孟子》书中引前儒之言以子思、曾子为多;其次,《孟子》书中有不少思想与传为子思所作的《中庸》有密切关联,如论“诚”等;再次,与孟子生活时间相处很近的荀子^①,在其论衡当时诸家之学时,明确把子思和孟子作为一派并提,所谓“子思唱之,孟轲和之”(《荀子·非十二子》),荀子是战国儒家的殿军,应该对思孟间的关联比较清楚。而晚近的考古发现,又表明荀子之说或许不虚^②。因此,说孟子是子思思想的传人,与事实相去不会太大。

孟子的生平经历,与其崇敬的孔子有很多相似之处,这主要表现在:一、与孔子一样,他也长期开门授徒,即使在游历诸国时,学生们还是伴随其左右;二、与孔子一样,他也有强烈的从政愿望,希望把自己的政治理想付诸实践,因此中年开始他也周游列国游说,而“仆仆于道路”的结果和孔子也差不多,没有哪位国君真正愿意接受其政治主张;三、与孔子一样,晚年时孟子也退居故里,与学生一起讨论学问、著书立说。这里我简单叙述一下孟子以上三方面的情况。

孟子曾说过:“君子有三乐,而王天下不与存焉。父母俱存,兄弟无故,一乐也;仰不愧于天,俯不忤于地,二乐也;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三乐也。君子有三乐,而王天下不与存焉!”(《尽心上》)孟子用先秦特有的强调句式即前后的复句,来强调从事教育之“乐”,说明他把从事教育看得比称王天下还要有价值,看来他确实在长期的教学活动中获得过很大的慰藉。由于长期从事教育,孟子的学生尽管没有孔子“弟子三千,贤人七十有二”那么多,但可以想见也一定不少。如他在游历齐国时,已经是“后车数十乘,从者数百人”(《滕文公下》),这所“从”的“数百人”,都是他的学生。只是由于没有类似司马迁为孔子学生专作的《仲尼弟子列传》这种比较可信的资料,所以我们对孟子学生的情况了解不多。现在能确定的也仅有乐正子、万章、公孙丑、公都子、陈臻、充虞、咸丘蒙、陈代、彭更、屋庐子、桃应、徐辟、孟仲子等十几人,他们都见诸

① 按通行的说法,孟子约卒于公元前 289 年,荀子约生于公元前 313 年,那么孟子卒时,荀子已二十四岁。

② 按: 1973 年,湖南长沙马王堆出土帛书中有《五行》篇,1993 年湖北荆门郭店出土楚简中也有《五行》篇,研究者认为它们与战国时代的思孟学派有很大关联。

于《孟子》书中。后世有学者在这方面做过一些研究和考证,但其结论未被学界普遍接受,而所增人数也实在有限,所以不提也罢。

孟子中年开始带领弟子们周游列国,从事政治活动,历时二十多年。关于孟子的游历活动,历来有各种不同说法,学者们的考证更是不少,远的就不说了,如元代的程复心,明代的陈士远,清代的阎若璩、周广业、魏源、张宗泰、崔述,近人钱穆、罗根泽、杨伯峻等的研究,可谓言人人殊,莫衷一是。这里,我不想用那些复杂的考证来困扰读者,仅笼统地叙述一下孟子的游历。

大致说来,孟子是四十来岁开始其政治游历的。在此之前,他或许已有了短暂在邹从政的经历。孟子的游历,到过齐、宋、薛、鲁、滕、梁(魏)等国,其间还曾返回过邹国。孟子在各国的时间有长有短,有的仅是路过,有的则去过数次,旅居时间也较长。其中,去过次数最多、旅居时间最长的是齐国。

孟子所以屡次游齐,并在那里居住的时间最长,历来有多种解释。较合理的推想不外乎三点:其一,当时齐国(威王、宣王统治时期)是“战国七雄”中军事上最强大的国家之一。尤其是公元前341年(齐威王十六年)齐国在著名的“马陵之战”中,用孙臆之计,大败魏军,俘杀魏太子申,迫使魏将庞涓自杀。此战不仅使同为“战国七雄”之一的魏国势力从此衰落下去,也使得齐国成为当时东方最强大的国家。孟子就是在此时游历齐国的,如果他的政治主张能被齐王采纳,则推行于天下显然要比一般的小国容易得多,因此孟子多次赴齐及在齐留滞时间最长是可以理解的。其二,齐国又是当时思想文化最繁荣的国家之一。威、宣之际,是齐国“稷下学宫”的鼎盛期。当时的稷下学宫容纳了诸子百家中几乎所有学派,如道、儒、法、名、兵、农、阴阳、轻重、纵横诸家;而汇集的天下贤士最多时达千人以上,其中不乏名流,如淳于髡、邹衍、田骈、慎到、接予、季真、环渊、彭蒙、宋钐、尹文、田巴、倪说、鲁仲连、邹奭以及稍后的荀子等。而孟子也是当时稷下学宫中的著名学者之一,尽管有少数学者对此持不同意见。在稷下学宫中,无论学术派别、思想观点、政治倾向,包括国别、年龄、资历等,都可以自由发挥观点,战国时期所谓“百家争鸣”之真正体现,以这里为最典型。孟子之所以在齐游历时间最长,这点无疑也起到重大作用。事实上,从孟子的整个思想来看,可说他既吸收诸家思想,又批判诸家思想,这是齐国稷下学宫为他提供的条件。其三,从功利立场来说,

齐宣王时，孟子已成为当时稷下学宫中所谓“不治而议论”（《史记·田敬仲完列传》）、“不任职而论国事”（《盐铁论·论儒》）的“上大夫”（也称“卿”），这或也是孟子居齐时久的原因吧？当然，这只是一般条件而非必要条件，当齐宣王使孟子很失望时，即使宣王想在国都临淄建一居所，又附赠很多钱财（“万钟”），想以此作为其优礼天下士大夫的典范，结果遭到孟子的断然拒绝（事见《公孙丑下》）。

至于孟子游历诸国所提的政治主张，基本上是一以贯之的，那就是主张“王道”而反对“霸道”，反复申论“仁政”的重要性、必要性和可行性。孟子在其游说中提出：“仁政”源于先王的“不忍人之心”，而从正经界、划井田开始，其中包括了“省刑罚，薄税敛，深耕易耨”等内容；他认为这可以使老百姓有一定的“恒产”（土地），能安居乐业，老人们能衣帛食肉，进而再使年青人受到道德教育；在孟子的“仁政”思想中，“民”具有关键意义，其地位高于国家，更高于君王，所以君王必须能安民、养民和保民；如果能做到这样，那么即使是弱国、小国，国君即使是好勇、好货、好色之徒，即使用木棒为武器，也可以打败秦、楚这种有“坚甲利兵”的强国、大国；就可以使其军队成为“王者之师”，别国的人民就会“箪食壶浆以迎王师”。

孟子在诸国颇受各国君主的优礼，明显要比当年的孔子来得幸运，这与当时各国普遍有“礼贤下士”的风气有很大关系。孟子在游说那些诸侯时，常常慷慨陈词，咄咄逼人，摆出一副“说大人则藐之”的架势，经常弄得那些国君狼狈不堪，只能“顾左右而言他”。但当时的君主都是一些讲求实际功利的人，他们都崇尚霸道，大国热衷于如何攻伐、兼并，小国则关心如何在夹缝中搞平衡、求生存。所以孟子那些陈意甚高的政治理想，在这些国君眼里就不能不是“迂远而阔于事情”，即如司马迁所说的：“天下方务于合从连横，以攻伐为贤，而孟轲乃述唐、虞、三代之德，是以所如者不合。”因此，孟子游说的结局也和孔子一样——到处碰壁。

经过这么多年的东奔西走、四处碰壁后，孟子最终明白，那些诸侯国君主虽然在“重士”的风气下对自己很客气，却从来没有认真对待过自己的政治主张，他的“王道”、“仁政”理想是难以实现了。到了这种境地，他又一次以孔子为榜样，放弃从政愿望，回归故里，与弟子们一起讲学论道，著书立说，希望通过这种形式，把自己的思想传于后世。于是就有了我们今天还能读到的《孟

子》这部著作。

有关《孟子》这部书的作者、篇数，也有不同意见。

关于作者，按司马迁的说法，主要是由孟子自著，而其弟子万章、公孙丑等参与其事；按赵岐、朱熹、焦循等历代研究者的观点，认为是孟子自著；而韩愈、苏辙、晁公武等学者的意见则认为是弟子万章、公孙丑之徒的追记。具体的说法，这里就无烦赘引了。目前学术界一般多采取司马迁的说法。

至于《孟子》的篇数，司马迁说“作《孟子》七篇”，而《汉书·艺文》却著录“《孟子》十一篇”。现存最早《孟子》注解的作者赵岐，分《孟子》为“内书”七篇，“外书”四篇，并提出：《性善辨》、《文说》、《孝经》、《为政》四篇“外书”，“其文不能宏深，不与内篇相似，似非《孟子》本真，后世依放而託也”。所以他不予作注。这以后，这四篇“外书”就渐渐亡佚了。今存的“外书”，学术界公认为是明末姚士粦的伪作，为清代吴騫所刊行。

今存的《孟子》一书共七篇，篇目依次是：《梁惠王》、《公孙丑》、《滕文公》、《离娄》、《万章》、《告子》、《尽心》。每篇各分上下，共 261 章（有的版本分为 260 章）。篇名取自每篇首章中的文字，没有特定含义。篇目的排列顺序，按赵岐《孟子篇叙》的说法则有特定含义。

孟子以为圣王之盛，惟有尧舜。尧舜之道，仁义为上，故以梁惠王问利国，对以仁义，为首篇也。

仁义根心，然后可以大行其政，故次之以公孙丑问管、晏之政，答以曾西之所羞也。

政莫美于反古之道也，滕文公乐反古，故次之以文公为世子，始有从善思礼之心也。

奉礼之谓明，明莫甚于离娄，故次之以离娄之明也。

明者当明其行，行莫大于孝，故次以万章问舜往于田号泣也。

孝道之本，在于情性，故次以告子论情性也。

情性在内而主于心，故次以尽心也；尽己之心，与天道通，道之极也，是以终于尽心也。

这实际是赵岐个人研读《孟子》一书的心得，谓其一家之言可矣。

二、孟子其人其书的升格过程

历史上有一个通行观点：孔子以后“儒分为八”，到战国中后期演变为两支。一支始于子夏，讲文献之学，数传而至荀子；一支始于曾参，究义理之学，二传而至孟子。以后，荀子便是汉代经学家所尊信的大部分儒家经传的先师，孟子则成为两宋起道学家所崇敬的不祧之祖。儒家内部这两派的分野，也就是所谓“学统”与“道统”之别，“汉学”与“宋学”之分。对这个说法，学术界的意见历来不同，这里就不必去细究了。此说至少有一点不错，即孟子其人其书的重要性确实是从唐宋之际开始凸显的。这以后，“孔孟之道”几乎就成了儒家思想的代名词。

孟子去世以后，以他为代表的儒家之一派似无太大的发展。到了战国的晚期，由荀子代表的一派渐渐崭露头角。荀子稍晚于孟子，他长期居齐，因学问博洽，曾三次出任“稷下学宫”的“祭酒”。他精通多种儒家经典，被认为是儒家经学早期传授中十分重要的人物。荀子在其《非十二子》中，对子思、孟子一派曾有严厉的批评，说他们“略法先王而不知其统，犹然而材剧志大，闻见杂博。案往旧造说，谓之‘五行’，甚僻违而无类，幽隐而无说，闭约而无解。案饰其辞而祇敬之曰：‘此真先君子之言也。’”荀子的批评只能说是当时儒家内部的派别斗争。

秦汉以降一直到两宋以前，孟子地位一直不高。孟子其人，只被视为一般的儒家学者；孟子其书，只能归入“子部”一类。在官私文献中，多是“周孔”或“孔颜”并提，鲜见有“孔孟”合称的。令人注意的是，东汉赵岐在注解《孟子》时，曾把孟子尊为“亚圣”，还提到西汉文帝时设置过《孟子》的“传记博士”。可“亚圣”之名，未被宋朝以前的官方认可；而“传记博士”即使存在过也为时很短，且不说此事因不见于《史记》、《汉书》记载而使后人颇生疑窦。当时，也有人批评孟子，最典型的应该是东汉的王充，他在《论衡》中专立了《刺孟》一篇，列举了孟子八个方面加以批评。

历史进入唐代，唐高祖、太宗、高宗三朝，在争论国子学当祭“周孔”还是“孔颜”时，唐太宗增加从左丘明到范宁二十二位儒者从祀孔庙时，甚至后来

唐玄宗封颜渊为“亚圣”和“兖国公”、封“孔门十哲”和“七十子”为侯、伯时，都对孟子只字未提。当时科举考试的“明经”科目中只有“三礼”（《周礼》、《仪礼》、《礼记》），“三传”（《左传》、《公羊传》、《穀梁传》）以及《周易》、《尚书》、《毛诗》这“九经”，《论语》和《孝经》则被列入了“兼通”，而《孟子》一书没有资格入选。此时的《孟子》一书，尚不如《老子》、《庄子》、《文子》、《列子》这四部道家著作，后者在唐玄宗时被列入科举，称之为“道举”，课试与“明经”相同。

但从中唐起，情况开始发生了变化。渐渐地，孟子之名厕于孔子之后，成为仅次于孔子的“贤人”；孟子其人被政府加封了爵号，从祀孔庙；孟子其书被增入儒经之列，悬为科举功令，不久又超越“五经”而跻身于“四书”，变成中国士人必读的官方教科书。这个变化过程，就是历史上的“孟子升格运动”^①。

变化最早出现在唐代宗的宝应二年（763年）。礼部侍郎杨綰上疏，建议把《孟子》与《论语》、《孝经》并列为一“兼经”，增为“明经”科目。此事虽未见允，但却开启了《孟子》由“子”升“经”的先声。

真正揭开孟子升格运动序幕的是韩愈。韩愈在其《原道》一文中首次提出了儒家的“道统”，并把孟子的名字上升到孔子之后，与那些“古圣先王”相提并论。韩愈以尊“孔孟”取代唐初的尊“孔颜”，在当时的学界引起了一些学者的关注。如唐末的皮日休，他于唐懿宗咸通四年（863年）上书朝廷，建议将《孟子》作为国家“明经”考试的单独一经。但韩、皮之说只是少数人的呼吁，并没有得到最高统治者的重视。

赵宋立国伊始，承袭唐代旧制，国子监所祭仍为“孔颜”，明经取士仍考“九经”。宋太祖、太宗、真宗三朝，重视孟子其人其书的大概也只有柳开和孙奭比较有名。柳开受皮日休影响，十分推崇孟子，但当时的影响并不大；孙奭乃是三朝宿儒，宋真宗大中祥符年间曾受命校勘《孟子》，由此“请以孟轲书镂板”，并撰成《孟子音义》二卷。

孟子升格被重新唤起，是在宋仁宗的庆历之际。当时，学坛上出现了一股社会思潮，而“尊孟”成为该思潮的取向之一。庆历思潮的领袖人物是范仲淹和欧阳修，他们都属于“尊孟”一派。如范仲淹发挥孟子“乐以天下，忧以天

① 有关这个过程，其中因需考证的内容很多，注释也太多，这里就不具体出注了，详细注释可参看拙作《唐宋间的孟子升格运动》一文，载于《中国社会科学》1993年第5期。